



中国经济文库·理论经济学精品系列

张岸元◎著

政策不确定性与国际直接投资

POLICY UNCERTAINTY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政策不确定性与国际直接投资

张岸元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策不确定性与国际直接投资/张岸元著.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5136-0850-3

I. ①政… II. ①张… III. ①经济政策—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研究—中国

IV. ①F83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4504 号

责任编辑 孟庆玲

责任审读 贺 静

责任印制 张江虹

封面设计 华子图文设计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刷者 北京市昌平区新兴胶印厂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136-0850-3/F·8931

定 价 38.00 元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68319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10-68359418 010-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010-68344225 88386794

内容摘要

政策的不确定性是国际直接投资者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投资者与政府关系的复杂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不确定性影响投资的机制和程度,但没有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因素产生的源泉。只要经济的疆界与政治的疆界存在差异,这种不确定性就有存身之地,就会以其政治性、非连续性、主观性、差异性等四个方面的显著特征,对投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政策不确定性问题的本质可以归结为东道国政治系统与母国经济系统之间的矛盾。我们不能笼统讨论某国政策不确定性的状况,民主政治制度也不具有特殊的政策稳定性含义。决定东道国政策不确定程度高低的关键因素,是该国决策政治过程的开放程度,而不是该国政治是否民主。

在一个封闭经济中,如果信息对称,市场完全竞争,同时政策变动的影响范围波及所有行业的所有投资者,那么这种不确定性就不值得投资者予以关注。在开放经济环境下,不存在上述条件。跨国公司试图通过多期博弈来确定东道国政府政策信誉的做法,可能误导其投资行为。而对东道国政府反常政策变动立即实施与之相对应的惩罚,往往是抑制政府政策变动的最有效工具。从长期看,如果东道国培育了一个外资可参与的、完善的公开政策市场,那么政策的不确定性问题将可能由于政策本身的内生性而逐步消失。

直接投资者可能实施一定程度的政策风险管理。风险管理的前提是有效的风险识别。风险确定之后,企业可以选择通过外部市场分散风险,也可以通过企业内部特殊的管理安排应付政策不确定性的挑战。

就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行为来研究政策的不确定性问题,具有独

特的标本意义。中国没有向外国投资者提供稳定的政治、政策环境的历史。1949 年之前频繁发生的战争、内乱以及 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国对外国资本的基本政策,曾经对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造成致命的影响。当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重新对直接投资者敞开大门时,新的政策承诺很难在短期内获得信誉。这一时期国内的意识形态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支持直接投资者的政治风险预期。1992 年之后,中国的外资流入量迅猛增长。但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有所回落。2000 年之后,外商再次掀起对华直接投资的热潮。

政策的不确定性至少是导致上述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外资政策决策过程的封闭性,是外国投资者认为中国存在较强的政策不确定性的根源。在 20 世纪 80 年代,虽然对外开放政策形成的“历史的路径依赖”,实际上已经割裂了国内意识形态斗争与对外经济政策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中国的领导人通过各种方式赋予政策以信誉,但改革开放政策仍然无法获得投资者的信任。1992 年开始的市场化改革以及 2001 年中国最终入世,增加了政策变动的内外约束。这些约束并没有增加政策的内生性,中国仍然没有形成外资政策的公开政策市场。因此,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中国与若干重要外资来源国家和地区之间政治关系的变化,很容易对在华外国厂商造成值得关注的影响。未来如果国际关系环境再度发生变化,外国投资者仍将有理由认为自身会被置于一种危险的境地。

2005 年以后,中国成为净资本输出国,围绕着外汇储备的多元化管理改革,中国开始显著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投资者自己开始面对国际政治、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如何妥善处理、应对此类风险需要复杂的策略。

从长期看,东道国外资政策基于效率、策略的变动是不可避免的。东道国政府、母国政府、“民族产业”、存量外资、流量外资之间,关于政策决策的斗争将进一步复杂。直接投资者不应奢望一个永恒的政策。决策过程的公开、可参与以及由此决定的政策变动的可预见性,将是东道国政府向外国投资者提供的最有价值的内容。

关键词: 国际直接投资;政策不确定性;跨国公司;东道国

目 录

CONTENTS

导 论 / 001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002
- 第二节 相关研究方法介绍 / 009
- 第三节 概念界定 / 012
- 第四节 逻辑与分析框架 / 019

第一章 文献回顾 / 021

- 第一节 基于技术、成本的 FDI 理论与政策不确定性问题 / 022
- 第二节 基于不确定性、内部化的 FDI 观点与政策不确定性 / 029
- 第三节 区位的观点、邓宁的“折中”与政策不确定性问题 / 036
- 第四节 跨国公司—政府关系的理论以及相关经验研究的结论 / 039
- 第五节 净现值(NPV)观点与实物期权的分析结果 / 049

本章小结 / 054

第二章 政策不确定性的理论 / 057

- 第一节 政策、政策变动、政策的不确定性与一般均衡 / 057
- 第二节 政策不确定性的思辨性见解 / 067
- 第三节 关于惩罚机制 / 075
- 第四节 公开政策市场的政策内生性问题 / 083

本章小结 / 089

第三章 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管理实践 / 091

- 第一节 风险识别 / 092

第二节 风险售出 / 102

第三节 政治风险的内部控制 / 110

本章小结 / 118

第四章 政治、政策变动与外商在华活动的历史路径 / 119

第一节 早期商业冒险 / 120

第二节 成熟时期 / 124

第三节 国民政府时期 / 131

本章小结 / 137

第五章 新时期的新问题 / 139

第一节 20 世纪 80 年代意识形态之争背景下的政治、政策不确定性 / 139

第二节 新政策不确定性因素的引入 / 149

第三节 20 世纪 90 年代的发展脉络 / 153

第四节 政治风险与中国 FDI 流量关系的计量研究 / 164

本章小结 / 175

结论、前瞻以及存疑 / 177

参考文献 / 183

附录 / 201

附录一 中国与外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情况 / 201

附录二 主要外资数据 / 202

附录三 跨国公司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交往 / 206

附录四 中国政府取缔非法传销的决心与外资直销公司的涅槃 / 209

附录五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外合资与外资并购问题 / 212

附录六 跨国公司对母国政策的影响:美国跨国公司与国会 / 223

附录七 在华半导体生产厂商面临的潜在危险 / 237

导 论

• 资本的不安全性不管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当资本不在其拥有者直接控制之下时,就会阻碍资本的流动。人们在离开自己出生的和亲朋好友居住的国度,带着自己已经固定的生活习惯,把自己托付给一个陌生的政府和新的法律时,都有一种天然的不情愿的情感,我在看到这种情感被削弱时,应该感到遗憾。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原理与税收》

本书即将讨论的问题似乎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

因为我们生活在历史终结的时代。资本主义宣称自己不战而胜;民主已经成了政治唯一正确的特征。从前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家、民族英雄,而今早已让位于丧失政治理想、政治道德、“理性”的官僚政客。激烈的革命、暴乱、不由分说的国有化只是昨日的梦魇,东道国政府与跨国公司之间温文尔雅的“博弈”,如今成了指导双方行为的圭臬。

那些作为激进政治思想之经济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进口替代理论、经济民族主义,已经依次向市场经济、出口导向以及经济全球化趋势屈服。“一个国家是生产土豆片还是计算机芯片并没有什么区别”之类的新经济自由主义观点成了新的教条^①。在东道国各种反国际直接投资的政策土崩瓦

^① 据说这是老布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迈克尔·博斯金的名言,转自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68.

解之后,现实中唯一可行的发展道路就是放弃原有雄心勃勃的产业政策,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进行禀赋积累。而跨国公司几乎拥有在国家间配置经济资源的所有手段与经验,于是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捐弃前嫌,等待“双赢”。

总之,狂飙的年代已逝,国际直接投资的政治、政策不确定性问题烟消云散。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002

基于以下方面的理由,本书对上述观点不以为然。

一、国际政治方面的原因

变化是永恒的。在世界秩序重建过程中,民族、国家、区域集团,国际组织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正在发生本质性变化;它们之间的游戏规则也处在激烈的调整中。推动这些变化的是两支破坏性力量。

第一支力量是真实的。冷战后的国际政治在经历了10年左右的无主题年代之后,又找到了新的主旋律——反恐。没有人相信恐怖主义确实构成对国际社会真正的威胁,但大家都意识到用反恐这一命题来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在政治上是正确的。有了反恐大旗,那些一度被视为神圣不可冒犯的国际交往准则可以过时。主权国家的尊严可有可无;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形同虚设^①。美国被称为世界民族的熔炉,但是它却蔑视其他民族文化传统的价值。它的成就使世界上许多民族国家惶惶不可终日,不知自身在国际舞台上存在的理由究竟何在。它的文明或许确实具有普遍性的终极价值,它或许最终也企图给世界带来永久的和平与安宁,但在此之前,世界需先饱尝歧视、压榨、动荡和“先发制人”的打击^②。

第二支力量是无形的。它躲在暗处与各种公开的政治势力相对抗。它

^① 在美国看来,除了人类共同面对的一些琐碎技术性事务之外,这些组织存在的主要价值仅仅在于是否能够准确揣摩它的意图,并且唯其马首是瞻。

^② 这是小布什总统以反恐为名制定的针对所谓“邪恶轴心国家”的核心战略。

的行动没有规则,但是时刻准备以最野蛮的方式向世界实施报复。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它这一次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却可能主要得益于上述那个国家的压力和臆断。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这支力量甚至是虚拟的,其存在仅限于满足那个国家获得国际行动合法性以及取得内部政治一致性之所需。

变是相对的。第一支力量(美国)与第二支力量(国际恐怖主义)的角逐,在淡化了国际政治的传统意识形态色彩之同时,也使得理想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日益丧失解释现实政治的能力。人们从事国际政治活动时不再信奉某种信念。传统的现实主义行为——对权力的追求以及“作为交换的政治”——充斥日常实践。此时的国际政治,作为人类发明的最有吸引力的游戏,空前鼓励着各种国家、非国家机构按照丛林原则处理问题。因此,世界没有变化,因为人类的野蛮依旧。

时代的变与不变,对于国际直接投资者来说都是利空。时代的变化,意味着国际商业环境在基本安全保障方面可能恶化,携带巨额财富穿梭于国际之间的行为会变得更加危险。时代的不变,则意味着直接投资者与政府交往的传统逻辑没有改变。在与东道国的交往过程中,直接投资者仍然是弱者,它们参与国际政治的唯一法宝就是“三角外交”^①。但是遗憾的是,跨国公司永远不可能拥有等同于国家的权势(格雷,2002)。对于东道国政府,跨国公司手中最强有力的手段仅限于投资承诺和撤资威胁。而当使用这一手段时,恰恰意味着使资产暴露在政治风险之中。

在世界秩序重建的过程中,民族、国家、区域集团、国际组织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正在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它们之间的游戏规则相应也处于激烈的调整中。

推动这些变化的是两支破坏性的力量。

^① “三角外交”指国家政府间、公司间、政府与公司间的三维外交。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国际交往模式。比如,斯特兰奇(Strange,1992)认为,这一外交模式已经构成了当代国家交往的基本特征。托夫勒更是持这一观点。他甚至认为“联合国最终也要给非国家机构留出席位,否则随着跨国公司的增长,与联合国分庭抗礼的组织将拔地而起”。阿尔温·托夫勒. 权利的转移[M]. 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81.

二、经济全球化的含义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讨论的政治风险(政治、政策不确定性),反映的是国际投资者的某种未知与迷茫——东道国那些对商业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重要政策变动,是否会发生、何时发生、有何后果等等。而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过程,对于减少国际投资者的这种未知与迷茫少有裨益。

第一,全球化绝不是各个经济体制都要殊途同归的终极状态……它不仅加强了现存的等级关系,而且还不断产生出新的等级关系^①。这种等级关系的客观性与人对平等的本能追求存在根本矛盾。当全球化带来的东道国经济增长无法弥合或者缩小这种等级差异时,各种极端政治行动也就具有了社会基础。

第二,在全球化背景下,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再贴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标签,人们只能泛之以“市场化国家”、“非市场化国家”或者“正在市场化国家”加以区别;直接投资者以前绝对不能前往的国家,如今都被纳入决策范围。这就大大增加了识别国家风险类型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东道国适时地推出了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诸多竞争性政策,但投资者却难以判断东道国的承诺是否具有稳固的政治基础^②。此时的跨国公司与其考虑东道国政策风险的有无,不如考虑这类风险之高低。

第三,全球化意味着竞争者的增多、竞争的加剧以及竞争战略的复杂化。这大大损害了跨国公司在政治风险面前待价而沽的能力。无论这些企业多么缺乏国际直接投资的经验,对东道国的政治、文化、法律制度多么一无所知,它们都必须参与游戏。伴随着国际化运营,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链条进一步延伸,出资人对海外资产的实际控制力大大下降,代理者施展道德风险的空间显著上升。出于自身职业生涯的考虑,海外资产的实际控制者往往有动力以各种方式系统地低估东道国的风险状况,极力维持甚至盲

① 约翰·格雷. 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68.

②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在国际权威金融杂志《欧洲货币》(Euromoney)的年度国家政治风险评级中,朝鲜近年来的政治风险得分基本上都是0分(满分为25分)。但是朝鲜也在改革开放(外商在新义州拥有的权利超过中国的经济特区)。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金正日的承诺或许比中亚某些民主国家议会通过的法案更具可信度。

目扩张海外业务。他们总是借口政治风险的不可抗拒,放弃对直接投资“踩刹车”。因此,跨国公司在理论上可能存在的风险回避措施,其实施效果都必须打折扣。

第四,目前的国际直接投资缺乏相应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相对于由世界贸易组织、双边、多边贸易安排、区域贸易集团等多层次的贸易安排叠加而成的国际贸易制度,现有国际直接投资的规制框架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外国投资者在经济领域的国民待遇、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承诺,构成了保护直接投资的法律基础。该基础不仅覆盖范围有限(以双边为主),而且通常只为投资者提供避免没收、强制国有化等基本财产安全方面的保障^①,无法起到全面消除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的作用。

第五,任何全球化措施都不涉及政策不确定性产生的国内根源。随着各国公共政策选择过程的复杂化,风险不仅仅来自东道国政府,而且越来越多地来自于民间机构、利益集团、舆论,乃至公众。外资政策作为东道国非市场决策的公共政策,其制订的理论基础、协调过程、效果评价,都过于复杂隐晦。由于无法完成社会福利函数的加总问题,因此并不存在一个“最优外资政策”。相对于东道国的公众,外资在东道国的利益相关者总是少数。外资可能确实导致了东道国整体福利改善,但是公众对外资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影响更为敏感。国际间的风吹草动都可能通过东道国的政治过程(Political Process)演化成为反对外资的行动。

作为上述诸因素作用的后果,在目前的国际直接投资领域中,东道国政策不确定性对直接投资的冲击趋于和缓,但范围趋于扩大,发生趋于经常。六、七十年代的那种以革命、没收、国有化为代表的典型政治风险冲击已经很少发生,而由东道国民众情绪导致的社会失控、政策承诺的突然取消、政府政策的反常变动等引起的“局部的没收”(Partially Expropriate)、“潜行的国有化”(Creeping Nationalization),逐步成为政治风险的主流(Yan & Bjornson, 1998)。陷入这一境地的直接投资者同样必须为海外资产的安全未雨

^① 近年来,有关国际法条款在原则上强调东道国对于没收、征用的跨国公司财产,必须予以立即(Prompt)、足额(Adequate)、有效(Paid in Convertible Currency)的支付与赔偿。

绸缪。

三、国际直接投资自身的特点

金融学的最新发展认为,资产的不可逆性、收益的不确定、投资时机的选择,是投资者应着重考虑的问题(迪克西特、平迪克,2002)。国际直接投资在这三个方面有着显著特点,这些特点意味着政策不确定性问题对直接投资行为构成重要影响。

从资产的可逆程度看,国际直接投资所形成的、分布于不同国家的控制性资产,存在较强的投资不可逆性^①。投资者必须在投资之前,对未来的各种不确定性给予较多的关注。

从未来收益看,东道国政府在确定利率、汇率、利润转移政策、当地采购规定、强制出口比例等这些影响直接投资回报的关键因素方面,拥有决定权。行政当局经常通过掌控这些参数的权力,去实现那些与市场力量背道而驰的政策目标。因此这些参数的变动经常以违背市场规律的非连续的方式进行。为应对这种变化,边际意义上的修修补补无济于事,直接投资者必须在战略上改弦更张。

在投资时机的选择方面,由于是在国际范围内决定其投资行为,因此,直接投资者在投资地点、投资时机以及投资方式的选择上都拥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与东道国政府博弈、推迟行动(以获得有关未来的更多信息)、储存与废弃、序列投资、购买政策等复杂的投资策略显得特别具有价值。

近几十年来逐步发展起来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早已经注意到了政治、政策因素对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除了产品周期理论及其修正(Vernon, 1966、1979)等少数主要基于技术因素的理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对跨国直接投资现象的大多数解释,都不排斥政治风险在其中的作用。

在早期的垄断优势理论中,跨国公司被认为可能拥有相对于东道国企

^① 这是因为:①这种资产在转让过程中必然遇到各种复杂的政策、法律障碍;②由于直接投资往往涉及公司的所有权资产,这类资产不是难以转让(几乎不存在相应的市场去发现价格),就是一旦转让,会给原拥有者带来重大损失(因为这类资产难以分割);③即使对于可转让的非股权实物资产,其价值也会由于二手资产市场普遍存在的“柠檬”问题(Akerlof, 1970),而得不到公正评估。

业的政治优势^①,这种优势被认为是引起企业扩张的重要因素(Hymer,1960;Kindleberger,1969)。而如果我们基于科斯1937年的论文,认为企业的存在、规模的扩大,是企业内部优势战胜分工所导致交易费用的结果;垂直一体化的跨国直接投资,可能仅仅是这种结果在国际范围内之表现的话(Williamson,1985;Buckley and Casson,1976;冼国明,1991),我们同样也必须在计算企业内部化能力与交易费用的过程中,对政治、政策的不确定问题予以必要的考量。至于绕过国家的特殊经济管理壁垒(Cave,1978)、实现某种国际分工安排(比如小岛清自称比较“系统”的海外直接投资理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Dunning,1973、1981)等这些更为“切实的”国际直接投资动机,则更容易受到东道国政策变化的影响。

四、中国外商投资的现实

虽然作者不认为中国是国际直接投资的高政治风险国家,但是,针对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活动来讨论政策的不确定性问题,仍然饶有趣味。

中国没有向国际投资者提供稳定政策环境的历史。即使是在直接投资大量涌入的20世纪90年代,在多数西方观察家眼里,中国仍然还只是一个宣布实行市场化改革不久的共产党国家。它奉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国内政权交接存在巨大隐患(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几乎所有西方主流财经杂志都在就“邓以后的问题”窃窃私语);政府规章、国内法律制度混乱;以知识产权为代表的企业无形资产得不到保护;国内市场分割严重;中央政府的产业政策不透明;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信口开河。

中国与若干主要投资来源国(地区)之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政治矛盾。日本投资者不会忘记20世纪80年代中国发生的抵制日货风潮以及中国民间强烈的反日情绪。90年代中期之前,日本大企业在华资产的规模、质量,似乎处在一种人为的抑制状态。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担忧,使得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与“雁行模式”下对东南亚的投资,形成鲜明对比。近年来发生的日航转机服务事件及东芝笔记本与三菱“帕杰罗”越野车召回事件以及京沪高速铁路方案之争,都明确地提醒投资者,撇开政治单纯讨论中日经济合作

^① 因为他们更能与东道国政府达成妥协或者获得有利的经营条件。

的设想是多么不切实际。

20 多年来美资的在华实践也耐人寻味。因为中美间的冲突是“即将发生”的(伯恩斯坦、芒罗,1997、布热津斯基,1997);即便中国未来实行了“儒家资本主义”,文明间的冲突也可能诱使中国与伊斯兰结盟,与西方为敌(亨廷顿,1998)。在中国人自己眼里,中美间在政治、安全、经济三方面都存在战略矛盾,中美矛盾的强度是美俄的 2 倍,美日的 6 倍,美欧的 4~6 倍^①。20 世纪 90 年代发生的若干事件,似乎也证实这些判断^②。在这样的国家关系背景下,如果美国仅仅在从事诸如麦当劳之类的“短平快”投资,似乎还可以理解,但是像摩托罗拉这样耗资逾百亿美元,将地区总部、研发中心以及敏感的半导体工厂都设在中国的大型跨国公司,无论如何是要对政治风险仔细掂量的。

当然,最后还有台湾地区。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台湾当局强调“戒急用忍”,明确提出所谓“南下政策”以遏制台商的“西进”势头^③;1995、1996 年的台海危机,两岸几乎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这时设想台商在决定对福建沿海、长三角地区投资时没有考虑政治风险,未免太过幼稚。

五、结 果

总之,国际直接投资不同于一般企业扩张之处,就在于其投资跨越了国家政治疆界以及社会、文化的巨大差异。直接投资形成的资产缺乏足够的流动性,其投入需要未来至少 10 年内产生的现金流以及最终的残值来回报。投资是不可逆的、且机会稍纵即逝。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冲突的结束,并没有终结民族、国家之间基于文化差异、国家利益冲突的国际斗争历史。全球化更是远没有使世界大同。国家间争夺外部经济资源的竞争,使得东道国外资政策在普遍向着有利于直接投资流入的方向调整之同时,越来越远离其国内政治基础。在中国这样有这独特发展目标的转型中的大国,这一矛盾尤为复杂。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直接投资者都仍然必须在充分考虑东道国政策不确定性的基础上进行决策。舍此别无他途。

① 阎学通. 美国霸权与中国安全[M].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26~29.

② 这些年中美间发生的重要事件包括:美对华最惠国待遇年度审核、1993 年的“银河号事件”、1995、1996 年的台海危机、1999 年的大使馆被炸事件以及此后影响较小的南海撞机事件。

③ “南下”指前往东南亚投资;“西进”指前往祖国内地。

第二节 相关研究方法介绍

本书并不奢望在研究方法上有什么创新之处。在理论分析部分,作者虽然运用了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弈论在内的多种分析工具,但是这些理论的引入都还仅仅停留在应用的层面上,并不涉及这些理论自身的创新。在实证部分则主要通过经济史的描述以及计量经济学手段来完成。

一、理论分析部分

作者认为,对于本文所讨论政策不确定性问题,必须首先从政治经济学甚至哲学的高度上进行思辨,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完全陷入琐碎的技术性分析而不能自拔。与此同时,国内经济学的教育传统似乎对我们也有这样的要求。

政治经济学的见解特别适用于探讨一种经济现象的宏观背景与长期本质。它感兴趣的是人在群体中的地位以及人群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人为什么会宿命般地陷入某种境地。如果经济人同样以效用最大化作为决策目标的话,那么政治经济学的经济人必然拥有一套特殊的效用观:他们不仅考虑不同决策所带来的基数效用变化,而且特别关注决策所引起的不同经济人之间基数效用的排序结果。由于未曾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有效简化与假设,政治经济学并没有形成什么复杂的研究的方法。固定的理论框架,简单直观、符合人们思维习惯的分析方法成了政治经济学的一大特色。

在政治经济学看来,个体经济人关于收益的斤斤计较缺乏意义;在此基础上的边际分析即使不是源于形而上学,其结果也是刻舟求剑。作为方法论,政治经济学为人们提供了改变自身境遇的更为实际的方案:帕累托改进(Paroto Improvement)的原则并不是有关人类行动的什么了不起的束缚;政治的经济化与经济的政治化,对权力的追求、依存与渗透,合作与冲突,都可以作为直接改变原有均衡的强有力手段——虽然这些手段在改善一部分人的状况的同时,几乎必然伴随以另一部分人的状况的恶化。

探讨政策不确定问题本质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其缺陷与其优点同样引

人注目。①该方法过于程式化,容易形成终极结论,从而使得理论本身缺乏弹性;②该方法是高度概括的,因而无法满足人们对细节、过程的好奇心;③如凯恩斯所言:“从长期看,我们都将死去”,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是如此具有“长期”的眼光,以至于对于只生活在“短期”的经济人来说没有意义。

可供弥补这些缺陷的,是当今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虽然作者对经济学领域的常见数学工具有所掌握,并且几乎阅读了近年来发表于国外主流经济学杂志的所有相关领域论文,但是完全用数学模型来讨论政策不确定性与直接投资问题仍然超出作者的能力。在很多情况下,文字似乎已经完全可以满足思想表述之所需。

其实对于那些特别简单或者特别复杂的经济现象,建立在主流经济学概念基础上的直观经济分析都可以找到用武之地。因为前者没有必要、后者不可能进行模型分析。而对于那些恰好适用于模型分析的经济问题,直观分析的价值则在于验证——验证人的直觉是多么的错误或者多么的可靠。本书主要用直观的分析方法讨论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厂商决策的机制^①;厂商对由此所产生的交易费用进行内部化的可能性;以及政策不确定性在宏观层面上对东道国外资流量可能带来的影响。

由于政策不确定性存在于政府与投资者之间,而博弈论恰恰是研究两个局中人情况下经济人行为模式的基本工具,因此用博弈论来分析投资者行为是顺理成章的。如前所述,全球化意味着可供投资者选择的东道国数量的增加。所有东道国都声称本国是投资者的天堂,而投资者无法识别这些国家的真实类型。因此,一国的政策不确定性状况可以被简化为政府承诺是否可信的问题。投资者将在东道国不确定性逐步得到缓解的过程中,逐步学习有关在东道国投资的知识(Chamley and Gale, 1994; Thimann and Thum, 1998; Cherian and Perotti, 2001)。本文尝试着以现有模型为基础,建立

① 传统观点认为,由于投资者之间的均衡以及资产、风险市场的完善,风险、不确定性问题不应构成妨碍投资者投资的因素(参见风险、不确定性词条。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而通过经济环境(封闭经济、开放经济)、信息状况(在投资者之间是否对称)、风险性质(波及范围)等因素的定性讨论,我们将发现,对于跨国直接投资来说,投资者之间的均衡状况无法维持,政策不确定性具备影响投资决策的基本条件。